

抗战时期师大附中的教员和校长

赵慈庚（遗作）

赵慈庚（1910—1999），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，1935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数学系，抗战时期曾经在北平师大附中任教五年，并且随校迁往后方陕南城固。此文写于1995年。

万事难得一个真字，抗战时期，北平师大附中迁至陕西城固，教员生活异常艰苦，附中这群教员，不但不改行他就或营利于禄，而教学之余孜孜进修，无不各安其素，视名利如浮云。此情此景，学生知之明切，感应之效，速于传邮。学生能衷心敬师，必能诚心聆教。此附中教育之可贵者也。

旧社会之校长，有权黜引教员。倘因此而使教员慑于失业，学校纪律或见严肃，而活泼之生机必泯。附中校长几无解聘教员，教员遂能扬眉吐气，加以各自勤奋，猷谋善道，乃能蔚为良好之校风，而著誉于国内。假设当时的校长，但有一点自树威信的心，希望他自己一呼，则员工百诺，他一定遭到教员的唾弃，学生的反感。假若他有权支配员工的精神享受，教员就不会安心工作，也必然降低教学水平。人人知道精神乞丐是不能做的。校长偶然会任性行事，但是这种任性只能是短暂的。附中的校长没有任性行事的机会——教员不听他的。

附中教员历来都有一点狂狷之气。形成这种意识的心理基础是“我的这份职务是凭学业成绩考出来的，没有任何夤缘情托。校长、主任只要把授课任务交给我，便别无管辖我的权力。”——当然他们也绝不拿课业作儿戏。不然的话教书的牌子砸了，以后就吃苦了。所以教务主任不大过问教师的工作。校长、主任无权，也不能对教员作月旦评，加框框，更不能操纵某种势力给某教员穿小鞋，设圈套。教员心情舒畅是工作活泼的起点。附中以往三十多年的历史里，未曾解聘教员。学业有成升为大学教员的不少，学校不能阻拦，自动离开附中的不多。这也是附中教员有信心，敢做事的原因。

办好一所学校，要办学觉得这学校有自己一份，学校的好坏与自己有关。附中教员至少有权支配自己所教的课程。他们可以在课程标准的条目上

按自己的思想驰骋，可以奔腾于课程标准之外。为了自己的声誉，绝不肯偷工减料。他们也有自己的主见，若想让他们像唱片，刚唱完“过五关”，刹那间翻过面来就唱“败走麦城”，那是办不到的。学校给教员的精神支持，是他们能运用自己的知识与技能，充分独立思考，筹划他认为最好的授课或工作方案。校长与教员的关系是从雇佣形式开始的，然而日常相处绝没有主仆痕迹。在教育场地上，互相信任要比互相监督好得多。旧日师大附中有所成就的原因，我以为主要在教员。

思想活泼，基于思想自由。北平师大的毕业生，在教育理论方面，表现着充分的自由。大致可以说他们都是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徒孙。但是他们登上讲台之后，谁也不把“杜威”两字挂在唇边。他们的教学方法，也不死抱着桑代克那套法规。教学上的活泼局面就是这样造成的。假若那时师大系统强令他的毕业生，每轮教学必以杜威为宗，我想这样把教师卡在一个模子里的政策，一定会把热气腾腾的爱国教师，一棒子打成辕下驹，槛内羊。不见动物园里的狮子，不睡也得睡，还有什么俊俏。最可惜的是马戏团养的猴子，铜锣一响，满身战栗，在俯首听命作表演的同时，每挪蹭两三步，要看看主人的面色和他手里的鞭子。另一种可笑的狗熊，它胆大体壮，但是隔着火圈一看见馒头，精神就来了。附中的教员绝不这样玷污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号。

受信任的附中教员，没有一个是只求上进的教书匠。他们孜孜终日，学生见而勤奋，蓬生麻中不扶自直。教员们相处以诚，出言不诡，各尽所能，慎而寡失。这也是一点成功的因素。私塾的冬烘先生，学识道德都不足为学生法，就靠孔丘的牌位给他压台，来窃取糊口之资。这种欺骗行为只能授生徒以伪，甚至上下交相欺，几何其不导俗于诈哉！

行政官僚机构，不论组织得如何完善，总是会扼杀创造性的。有一种万能的校长，他能把万能膏药贴在所有科目上，口内百样通，不论对哪一科教员他都能指手画脚地讲一套。谁不向他点头称善，谁就有小鞋可穿。倘若当年附中校长是这种加冕的猴子，教员就不会有教学的积极性，学校也不会有点滴的成绩。父母有过，子女且得谏之，师而有瑕亦应明言陈之，必如此乃能亲如家人，乃能收感化之效，不然积怨成恨，灾难随之，其何教育之可云。上之使下，莫不欲收指臂之效。然欲一按电钮，则教员转动如机器，此非待人之道。使教员为不食菟豆之牛马，彼将含羞忍辱之不暇，又何颜以见学生。尊师者能如此乎？

旧社会有一类校长，不谋培养青年，而以办学校为加官晋爵之政治资本，或养一批专业运动员，设一个雄厚的话剧团，再来一个庞大的歌咏队，好像给学校争声誉，实际是给校长要顶戴。这等司马昭之心反而降低了他的人品。以个人之私欲强加于群众，日久天长，莫不败露。

学校校长应力戒只顾眼前，同时不坚持永远执行一种主张，这因为历史上各种制度都经过衰退时期，永恒不变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处理事情，只能在必然与偶然之中作适当的选择。要想证实一项方针会取得更好的效果，从来都是不可能的。这犹如进行一场战争，主战的人如何能证实他的主张呢？那唯有战争之后才能有结论。办学的人要跟着时代慢慢地改进，一纸令文绝不能产生翻天覆地的革命。当提出一种新教育制度时，说它一定好或一定坏，都是错误的，到底是好还是坏，要在实行一段时期之后才可以做出评价。